

# 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

——以孔庆东“粗骂”为例

金萍华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本研究在梳理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背景的基础上，基于“污名”理论提出“互为污名者”概念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中的“污名”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来源，“污名”不会如某些传统污名研究所指出的导致“认同危机”，“污名”促进“政治认同”的形成。本研究采用“污名”研究的“互动”方法论范式分析孔庆东三次“粗骂”事件，得出“孔庆东采用互为污名化方式以呈现自身政治认同”之结论，此结论证成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以语言暴力获取的话语权力无以证成政治认同的合法性。

**【关键词】**社交媒体；污名；互为污名者；政治话语；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关于social media译作社交媒体、社会化媒体还是社会性媒体目前仍有争议，而其基本内涵及外延——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包括微博、博客、论坛、社交网络、播客、内容社区、维基等网络使用形式在内的新型在线媒体则大致得到认同。理论上，社交媒体为个体的言论自由权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传统媒体年代，这种权利并不充分。现实也确实是的，伴随网民数量的几何级上升趋势，互联网成为容纳最为广泛而多元言论的虚拟空间。所谓广泛既指因网民数量上升形成的公众自主言论数量的上升，也指言论所涉主题的多样；所谓多元则是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言论主体立场的多样。然多元广泛言论空间产生的直接后果则是目前社交媒体中“谩骂风”的盛行。

逻辑上，普通个体网民的“谩骂”很难被“听到”，然一旦选择或被赋予群体身份，放大的群体谩骂声则可能被听到。至于名人，名气越大，骂得越“狠”，“谩骂”传播越有效。若此，社交媒体中的“谩骂”就可能将自由言说权利的追求演变为话语权力的争夺。现实从现象上印证了逻辑。“网络‘哄客’”，他们通常以匿名和马甲的方式上网，对一些个人和事件进行某种绝对化、非理性的道德批判，使很多言论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嘲讽意味（涂光晋，2011）。；“‘意见领袖’们轻率的人格攻击、粗俗的自我陶醉和炫耀以及一言不合便喷薄而出的狂妄而空洞的威胁恐吓俯拾皆是”（胡泳，2012）。

**【作者简介】**金萍华，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社会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社会抗争’的嬗变及信息流动与预警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860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2AZD014；安徽大学“211工程”三期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名教授孔庆东的几次粗骂是社交媒体“谩骂风”中的典型案例。多位媒体人对此案例进行了解读，多种原因导致此类解读大都限于在简单描述“骂人”表象后直接指出骂人原因并明示价值判断。<sup>[1]</sup>一般而言，凡能引发公众关注且对公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个体或群体行为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然引发舆论聚焦的孔庆东“粗骂”行为并未引起学界更多关注，至今少有对此行为作学理分析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总试图缩短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其方法无非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与尽可能合理地推断。将事件本身置于其产生的背景与脉络中进行分析是尽可能客观描述的要件，而寻求成熟且相关的概念及理论框架以观照整体事件则是尽可能合理推断的可靠途径。本研究将在详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话语争斗的研究主题，相应改造“污名”概念及理论并以其为理论工具，分析孔庆东“粗骂”案例以图探究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之真相。

倘若传统媒体年代的政治话语“是一个过程，表达的是从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向现实社会、政治层面运动，并由此对现实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发展、转变产生作用的过程”（薛洪生、黄琦，2010），那么在社交媒体中，至少从呈现方式上看，这个过程不再是完整、有序的，而经常是片段式、无章法、庞杂的。

## 二、研究背景

### 背景一：自由主义仍具“强势”——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的现有格局

“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动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刘华蓉，2001:7）。就大众之“众”言，社交媒体是迄今最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而在国内各方政治利益群体格局不明朗的态势下，这种媒体形态从一开始就深涉政治活动甚至成为政治本身。

一般而言，政治利益群体的合法性源于其所倡导的思想或观念的合理性，各方论争其思想或观念合理性的过程也就成了争夺群体合法性地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以社会思潮面貌出现的政治思潮得以形成。对此，国内学者有“三大思潮”、“六大思潮”、“八大思潮”等思路或提法。萧功秦认为，当代中国有六大社会思潮，分别为自由主义启蒙思潮、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sup>[2]</sup>马立诚则将其归为八种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马立诚，2011）。而关于“三大思潮”提法的思路，学者们的观点不完全同一。顾肃认为：当代社会思潮中激进与保守、左与右之间的争论围绕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原则而展开。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理论则试图兼顾左与右（顾肃，2013）。房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房宁，2006）。袁庚华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潮中，有三股较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势力，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诉求。其他思潮，如“新左派”、“新儒家”，目前还只活跃在学术、文化范畴内。三股政治势力分别是：权贵集团、自由派和毛派。<sup>[3]</sup>

从表象上看，不管是“三大”、“六大”还是“八大”，“多元”是目前国内思潮现状，而当“多元思潮”与“社交媒体”并置同一时代，思潮间若有话语争斗定然激烈。确实，社交媒体中“谩骂风”的席卷之地往往发生在与多元政治思潮相关的话语争斗领域中。目前社交媒体中多元政治思潮争斗已大致形成基本力量格局。

有研究者认为：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中国的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融入国际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努力向大众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这叫启蒙。媒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操作，因此中国的媒体普遍倾向自由

主义。<sup>[4]</sup>“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新应用的日趋丰富,自由主义完成了从意见领袖到普通网民、从学术走向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网络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日盛”(刘瑞生,2012)。基于此,尽管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来,主义之争成为我国学术界独特的一道风景。在这场争论中,影响最大的两派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sup>[5]</sup>,尽管互联网兴起之后,包括新左派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都获取了话语争斗平台,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出现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的自由主义(刘瑞生,2012)仍因其与资本、技术的天然契合以及为当下多数社会矛盾无条件提供支持的理论能量在话语争斗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近日一份由微博用户名为“鹏媒体赵鹏”的网络知名人士所提供的“新浪微博价值排行榜”<sup>[6]</sup>可窥“此格局”一斑。许纪霖曾就三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理解、对经济领域问题的观点以及对政治领域问题的观点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作过区分<sup>[7]</sup>,以此区分标准对照“鹏媒体赵鹏”所提供的榜单前十名认证用户日常言论,可以发现除“头条新闻”以外其余九名认证用户均持自由主义观点。

## 背景二:互“贴标签”——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的基本策略

作为外来语的标签(label)一词本指十八世纪初欧洲社会用于商品识别的资讯纸卡或牌子,后来社会科学将此名词广泛运用于“社会角色”、“刻板印象”、“身份认同”、“强化”等多种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被贴标签对象总因其被赋予的明确的标示(通常表现为文字符号)而更具社会识别度。

标签是符号,某种意义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的生存是种标签化生存。理论上,在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亚文化形态愈发丰富、社会变革愈发迅捷的当代,“贴标签”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整体社会的认知成本,当然,这基于“标签”的价值中立以及与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的符合程度。而事实往往是并不中立的价值加上符号“所指”特有的抽象能力,使“标签”过于简化甚至扭曲了现实本身。

“贴标签”是社交媒体中“谩骂”的核心手段,一旦各政治群体间的话语争斗演变为“谩骂”,“公知”、“带路党”、“五毛党”等极具代表性的赋予各政治群体的标签频出就不难理解了。“公知”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西方社会中原本令人尊崇的称谓在中国社交媒体中被戏谑成“公知”甚至“母知”。“这个简称置换了‘公共知识分子’一词丰富的所指——‘公知’不再具有浓厚的褒义色彩、强烈的担当情怀、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成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标签”(李卓,2013)。另外,“带路党”源于“美军来了我带路”言论,与之相近的标签有“卖国贼”、“汉奸”等。而“五毛党”之“‘五毛’由一些人讥讽网评员‘奉命发一条评论能赚五毛钱’而来,其实并没有可靠根据”(劳麟书,2012)。

且不论目前国内通常将复杂的政治思潮二分为“左右之争”的过于简单化,也暂且不论常被归为“左”或“右”者是否是严谨学术意义上的“左派”或“右派”,无可否认的是,“公知”、“带路党”和“五毛党”确实是被归为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两个群体各自为对手所贴之“标签”。在社交媒体中,本研究分析对象孔庆东常被贴上“左派”标签。

## 三、政治认同:“污名”理论的实践可能

上世纪六十年代,戈夫曼基于古希腊人指代身体记号的“stigma”(污名)一词开始从社会学角度建构污名概念及相关理论。在戈夫曼看来,污名是指广泛抹黑一个个体,把一个健全正常的人变成有污点缺陷的人的特征。特征本身谈不上丢脸与否。污名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戈夫曼,2009:1-4)。之后,Dovidio等人将污名定义为至少涉及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基于某些突出标识的差异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或群体的贬损(a consequent devaluation)的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Dovidio, Major & Crocker, 2000)。Leary等人将污名描述为通过避免、排除(excluding)、排斥(ostracizing)或最少互动(minimizing



interaction)的方式使一类人得以区隔的共同特征(Leary & Schreindorfer, 1998: 15)。Link等人则认为当“贴标签、负面刻板印象、排除、歧视、低阶层(low status)”等各因素在一个权力情境(power situation)中被叠加出现时,污名就形成了(Link & Phelan, 2001)。由上可知,不管是戈夫曼还是之后其他研究者都强调了污名的“关系”特征。如Brenda Major等人所认为的,污名并不存在于人本身而是存在于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Brenda & Laurie, 2005)。

国内有学者认为,截止到目前,关于污名的研究仍然缺乏十分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但学者的研究轨迹十分清晰,即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前者关注社会和个人层面所描述的污名产生和表现形式,强调制度性的抛离和排斥;后者则关注微观的认知层面,强调污名的维度和心理表征(管健,2007)。也就是说,既有研究中鲜少将污名理论运用于政治学领域以研究政治话语中的污名现象的。现实为理论研究提供依据并呼唤理论的观照。污名理论所分析之污名行为的核心特征即为“贴标签”,且所贴标签具有贬损属性。目前国内社交媒体中各政治派别互贴标签行为之普遍、所贴标签侮辱性符指之常见以及此类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关系”和“情境”特征,均符合既有污名理论之观照视野。

本研究以污名理论视野观照目前国内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现状,采用污名理论的互动研究(Interactive studies)方法论范式,提取“认同(identity)概念作为主要变量,通过分析孔庆东三次“粗骂”案例呈现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的污名现状并试图探求争斗真相。

关于“污名”研究的“互动”方法论范式,Crocker等人认为,社会污名研究中被污名者(stigmatized)和未被污名者(nonstigmatized)之间的互动研究是最有意义但同时又是最少被理解的研究领域(Crocker, Major & Steele, 1998)。Michelle R. Hebl等人则认为,较之过往,污名者(stigmatizers)与被污名者(targets)之间的互动研究更为少见,但互动范式确实为理解污名相关现象提供了其他范式无法提供的视角(Michelle, John & Dovidio, 2005)。本研究在考察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决定采用互动范式,在污名者、被污名者等概念基础上提出“互为污名者”(co-stigmatizers)、互为污名化(co-stigmatization)概念。“互为污名化”表明了污名过程的互动特征,而所谓“互为污名者”,则是互为污名的结果,即研究对象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污名者又是被污名者。“孔庆东粗骂”案例表象主要显示孔庆东作为污名者一方,而案例所涉背景则充分呈现出另一方污名者。

污名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Identity,中文翻译为身份或认同。简单言,认同就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戈夫曼在污名研究中所提及的“社会身份”、“个人身份”、“自我身份”基本都被赋予了社会建构的意义。关于认同的社会建构性,亨廷顿的观点是:认同建立在互动关系之中,任何层面上的认同,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来界定(亨廷顿,1998:134)。卡斯特在认同的社会建构论基础上提出了认同的“内化”观点。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而意义则是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目的的象征性许可(identification)。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卡斯特,2006:5-6)。本研究坚持:认同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体的,是个体内在化社会建构的过程与结果。

“污名”理论视野中的“认同”研究主要表现为认同危机理论(Identity threat theories)研究。该理论总体假设污名将会使个体置于其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受到威胁的体验中(Brenda & Laurie, 2005)。Steele等人则假设标示一个群体遭到贬低、边缘化和降低社会地位的文化知识或情境线索会导致社会认同危机(Steele, Spencer & Aronson, 2002),Tajfel等人将此危机认作“在一个被贬值的社会群体或类别中源于群体身份的“自我”所受到的威胁”(Tajfel & Turner, 1986)。

倘若以上传统污名研究假设“污名导致认同危机”,那么基于社交媒体中作为政治话语争斗

手段的“污名”与“认同”的关系，本研究将对此假设作较大的修正，在考察现象并获取理论框架支持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为：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中的“污名”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来源，“污名”不会导致“认同危机”，“污名”将促进“政治认同”的形成。

“政治认同”在政治学中是个相对成熟的概念，国内外不同研究者对此概念给出了多种界定。结合本研究主题及对象，我们主要参考其中一种——“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此界定首先明确了政治认同在心理上的归属特征，这符合“认同”的“内在化”内涵特征；其次明确了行动上的实践特征，“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主观意识领域，还专属于政治实践的领域，是政治价值的接受过程和行为过程的统一”（方旭光，2006）。由此，本研究将“政治认同”界定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将对于某种政治体系的归属情感内在化的动态过程。我们将揭示：作为个体的孔庆东是如何通过污名互动行为呈现自身的政治认同的。

#### 四、孔庆东“粗骂”：“污名”与“政治认同”的勾连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在社交媒体的政治话语争斗中占有相对强势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其主要争斗对手的左派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所谓“强弱势”指的是话语影响力度。反应话语影响力的最直接指标是话语受众数量，微博中体现为粉丝数。基于社交媒体赋予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左派改变争斗格局的可能性这一事实，我们认为，被贴上“左派”标签的孔庆东多次以“粗骂”方式自行撕裂既有的社会身份同其意欲通过社交媒体提升政治话语影响力相关，撕裂既有社会身份是为了在多重身份的选择中优先凸显其政治身份。

2011年11月7日下午3点21分，孔庆东主动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X你妈的！”。11月11日新华社发文批判孔庆东缺失起码的公民素质。孔庆东对此继续发博文质问“新华社是否要造反”。11月17日、18日，山西、河北民众打出条幅火烧南方系报纸，新华社与各方论坛谴责

焚烧行为。紧接着，腾讯组织投票，结果为60%网民支持孔庆东骂人。之后，“挺孔派”与“倒孔派”为投票结果继续争执。

2012年1月19日，孔庆东在“第一视频”“孔庆东有话说”节目中针对内地儿童香港地铁吃面事件骂“有些香港人是狗”。《南方都市报》微博于1月22日发微博称“孔庆东：香港人很多是狗 不说普通话 是王八蛋”。孔庆东回应“某些媒体断章取义，恶意歪曲”。之后香港人骂内地人为蝗虫。各方媒体相继报道与评论。

在中国文化中，以“妈”骂人或以“狗”骂人均有违基本道德规范。同之前“左右两方”互贴富有政治意味标签的污名方式不同，孔庆东这两次粗骂一开始均采用表面无涉政治立场的俗世污名策略，作为名教授的孔庆东以此“俗骂”刻意自行撕裂已经获取的社会身份，有违常理。若非心智失常，此污名行为定有动机可溯。然动机本身属内在心理机制，若无机会直接测量，则只能通过其外显行为作逻辑推断。

这两次粗骂中的《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均属南方系<sup>[8]</sup>媒体，孔庆东与南方系分属不同的政治思潮，这可从孔庆东“三妈”之骂前的博文标题得见。如“自由不是民主”、“社会主义风景独好”、“红旗之下有汉奸”、“红歌一声震汉奸”、“卖国导致人民革命”等。另外，孔庆东将南方报业正面报道的茅于軾斥之为汉奸、盛赞南方系质疑的朝鲜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目前互联网言论太自由而不是南方系表达的互联网监管体制过于严苛等。<sup>[9]</sup>此类博文立场同南方系的立场相左。反观孔庆东争斗对象南方系，其代表刊物《南方周末》曾被《纽约时报》

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sup>[10]</sup>。由是，孔庆东采用赋予对手“汉奸”、“卖国”等污名标签的策略高调刻意呈现出对立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事实上，同样的污名策略也为孔庆东之争斗对象——秉持自由主义立场之群体所采用。我们以“孔庆东”为关键词，在凯迪社区搜索孔庆东“三妈”之骂前一年也即2010年11月7日至2011年11月6日阶段的相关条项，搜索条数为590，除去孔庆东自己博文的转帖条项，其余条项多数将孔庆东作为对立面，且点击数少则数千次多则数万次。此类条项中，孔庆东被赋予的标签同样是侮辱性的，如“文革余孽”、“民主骗子”、“五毛党”、“反党、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猫左”等。<sup>[11]</sup>

由上，我们将孔庆东和他的对立方称作“互为污名者”。据前，互为污名者的争斗力量格局并不均衡，可以谨慎推断弱势污名者具有改变弱势地位的动机可能。由此，我们推测，孔庆东两次采用无涉政治立场的较为极端的俗世辱骂方式，意在获取更多无明确政治立场者的关注，进而获取明示自身政治身份的更具影响力的机会。本研究通过考察紧随孔庆东“三妈”事件后四天的相关微博内容以及几个标志性阶段粉丝数的变化对此推测进行了较为有力的证明。

1、昨天半夜至现在，粉丝增加数千，谢谢亲们！包括汉奸儿孙们（11月8日11:45）；

2、一天功夫，粉丝增加一万。新浪的敌人气死啦。（11月8日17:45）；

3、俺现在的粉丝数：177777。乌拉！（11月9日21:16）；

4、两天的功夫，粉丝从15万多飙升到18万，多谢南方报系的反共反华志士哦！（11月10日11:42）；

5、不带这样的，一眨眼粉丝超过十九万了，谁受得了啊？（11月10日22:34）；

6、热烈庆祝孔庆东微博粉丝猛增四万，一举突破二十万，提前完成新浪妹妹的央求！（11月11日14:31）；

7、粉丝猛增四万自贺：万丈豪情骂汉奸，万民拥戴乐翻天。万家灯火心头照，万里神州魂梦牵。（11月11日14:53）

依以上内容不难推断，孔庆东以粉丝量增加作为衡量争斗胜负的重要标准。事实上，孔庆东在“三妈”事件前粉丝量为15万，“三妈”事件后四天左右时间超过20万，“香港狗”事件后的2012年年中超过100万，而至2013年年中孔庆东粉丝数量已接近250万。也就是说，孔庆东通过两次俗世粗骂在获取更多话语受众的同时获取了更广泛地呈现政治认同的机会。

2011年11月8日也即“三妈”事件第二天，“第一视频”“孔庆东有话说”节目发布题为“北大教授孔庆东怒骂‘汉奸媒体’”视频，孔庆东在视频中称：“一大早起来，有成千上万的汉奸向孔和尚汹涌扑来，这其中就包括很多无良记者”，称：“以‘南都’为代表的媒体为汉奸媒体，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011年11月11日孔庆东在“第一视频”“孔庆东有话说”节目中称：“新华社带头制作虚假新闻，带头向‘汉奸媒体’屈服……没想到你们现在竟然脱离党中央的领导，公然向‘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并称：“我骂的，只是汉奸。”2012年1月20日也即“香港狗”事件第二天，“第一视频”“孔庆东有话说”节目发布题为“环球时报刊文：不能随意给人贴‘汉奸’标签”视频，孔庆东在视频中称：“汉奸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了……现在这帮汉奸都害怕了，说别人是汉奸了……在马上到来的龙年这一年里，我相信‘汉奸’一词的使用，会越来越普遍，会越来越频繁……要做好‘防火防盗防汉奸’的工作。”

由上可知，孔庆东几乎是在通过两次俗世粗骂获取公众关注的同时为对手强势张贴“汉奸”标签的。逻辑上，作为互为污名中的一方，容易拥有对手被赋予的污名标签内涵的对立意指。也就是说，孔庆东在贴出“汉奸”标签的同时，无形中为自己贴上了“爱国者”的标签，这张标签正是其政治认同合法性的来源。事实上，两次俗世粗骂之前，孔庆东就多次在博文中公然称政治话语争斗对手为“汉奸”。不管这种张贴“汉奸”标签方式属有规划的争斗策略还是一时一事的争斗言论，较难否认的事实是：孔庆东通过俗世粗骂为后续争斗话语扩大了言语覆盖范围，继而



以“汉奸”标签置对方于非法地位，从而为自己获取“爱国者”身份，以求证成其政治认同的合法性。

倘若前两次粗骂均因“被骂方”的特殊性和影响力——南方报系作为媒体的影响力和香港人作为特殊群体的影响力——而存在孔庆东刻意吸引公众关注的巨大可能，那么，我们更愿意将孔庆东在微博中针对一名普通网民的正常评论而仍以“汉奸”标签进行辱骂之行为视作其政治身份“内化”后的条件反射，如他自己之前曾在博文中提及的“汉奸们倒打一耙，说‘你看，孔庆东把凡是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说成是汉奸’”。

2012年5月6日，孔庆东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诗《立春过后是立夏》。大学生网民关凯元评价此诗，认为“诗已经不错，可确实格律不对，就算不严格按照古人韵部，好歹孤仄孤平不该犯。”很快孔庆东回复此评价，“你不要装作懂格律好不好？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你连原诗都没看，你就是个狗汉奸，你当我不知道啊！你懂你妈的什么孤平？我看你妈又孤又平！”2012年5月底，关凯元向海淀区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状告孔庆东侵犯其名誉权。2013年5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微博上骂人的孔庆东败诉，要求其向关凯元书面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00元。

戈夫曼的污名理论中关于群体定位问题提出“内群体”概念。所谓内群体大致指蒙受污名者所属的能使其丢脸的群体（戈夫曼，2009：153）。就“认同”的“内化”特质言，我们认为“内群体”定位就是已被“内化”的群体身份定位。戈夫曼认为，“采取内群体立场的职业人员会倡导一种好勇斗狠、沙文主义的路线，甚至到了赞成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程度。如果以此为行动方针，处于混合接触中的蒙受污名者将赞美他这种人假定会有的特别价值和贡献。他还可以炫耀本可以轻易掩饰起来的某些典型特征”（戈夫曼，2009：154）。我们知道，孔庆东及其被归入的左派拥有“五毛”甚至“文革余孽”等污名标签，戈夫曼的“内群体”概念基本能解释孔庆东第三次粗骂行径，此次粗骂是孔庆东内化群体身份，作为内群体一员的极端行为。

除了“内群体”，戈夫曼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外群体定位”问题。“外群体”指“常人以及由常人组成的更大社会”（戈夫曼，2009：156）。我们大致可以将孔庆东第三次粗骂对象关元凯归入异于孔庆东内群体身份的外群体一员。污名理论假定外群体是了解内群体之“丢脸特征”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假定孔庆东认为关元凯是了解其以“爱国者”形象呈现的作为左派的政治认同的。若此，一旦作为外群体成员的关元凯有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已内化群体身份的孔庆东自然认定其质疑和反对的是他的政治身份而非其他身份，比如应精通古诗词格律的中文系教授身份等。于是，采用污名“常人”的方式，孔庆东呈现了已经内化的政治认同。

## 五、结论

某种意义上，“话语权”可说是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社交媒体年代最具理论张力和实践意义的概念。传统媒体年代，公众力求宪法赋予的自由充分言说权利而往往不得。网络时代，技术赋权，公众尤其是意见领袖却不再满足于自由言说权利而是追求并尽可能扩大话语权力。政治话语争斗中越演越烈的污名化现象正是源于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互为污名化是目前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的表象。本研究认为，此表象之实质是作为个体的互为污名者政治认同的寻求与呈现。其间，污名标签往往成了互为污名者证成自身身份合法性的意义来源。孔庆东多次通过博文呈现他对毛时代的热爱表明他非但不反对甚至刻意迎合“被左派”。而互为污名的另一方也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了对“被公知”的接受。萧翰在博文中说：“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及他们以前不敢自认‘公知’，担心自己学问不够格，现在这个词既然被这么污名化了反倒无所谓，贴就贴吧，标签。”<sup>[12]</sup>另外，《南都周刊》1月14日发表《一名“公知”的微幸福》文章，文中称“所谓‘公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sup>[13]</sup>

米尔斯说：“一切政治都是权力斗争，而最基本的权力就是暴力。”<sup>[14]</sup>污名化的政治话语争斗本质上属于语言暴力。互为污名双方不同程度上默认对手所赋予的污名标签这一事实或许算不上是政治话语争斗的坏结果，但权力一旦和“暴力”而不是和“法”连在一起，即便获取了更大的话语影响力，言说者身份仍然可疑，自认获取的政治认同仍无合法性。

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仍将继续，某种意义上，“话语共识”仅是理想。然争斗之话语也可以追求哈贝马斯的言语行为有效性要求——真实性、公正性、真诚性、可理解性（哈贝马斯，2005）。于争斗方，若“污名化”无法提供政治认同合法性，何不理性言说？

#### 注释：

- [1] 具体文章内容参见任韧. 以公共语言讨论公共事件——评孔庆东“香港人，很多，是狗！”[J]. 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单仁平. “脏话风”为何越刮越烈[J]. 上海采风，2012（1）；王石川. 爆粗口的孔庆东败诉了[N]. 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10日
- [2] 萧功秦.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EB].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2011/0606/36930.html>
- [3] 袁庚华. 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主未来[EB]. 人民论坛网 <http://www.rmlt.com.cn/News/201302/201302210946122576.html>
- [4] 曹豫生. 2009——中国左派扎堆出书[EB]. 环球网 <http://blog.huanqiu.com/134176/2009-11-06/366513/>
- [5] 徐友渔.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合[EB]. 四月网 <http://www.m4.cn/space/1166220.shtml>
- [6] “鹏媒体赵鹏”2013年6月24日7:01在新浪微博发布“新浪微博价值排行榜”第一期内容[http://weibo.com/44692221?page=23&pre\\_page=24&end\\_id=3598544064098960&max\\_sign=-1](http://weibo.com/44692221?page=23&pre_page=24&end_id=3598544064098960&max_sign=-1)
- [7] 参考许纪霖. 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EB].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07.htm](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07.htm)
- [8] “南方系”称谓并非泛指整个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所有媒体，特指“粗骂”事件涉及之两大媒体——《南方人物周刊》与《南方都市报》以及孔庆东公开反对过的《南方周末》
- [9] 见孔庆东个人新浪微博
- [10] Rosenthal, Elisabeth. Under Pressure, Chinese Newspaper Pulls Exposé on a Charit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02 [2008-03-19], 转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6%B9%E5%91%A8%E6%9C%AB>
- [11] 参见网页<http://search.kdnet.net/?q=%BF%D7%C7%EC%B6%AB&sa=%CB%D1%CB%F7&category=title&boardid=0&arrival=2010-11-07&departure=2011-11-06>
- [12] 萧翰. 尴尬的“公知”[EB]. 2013年2月21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3/0221/77455.html>
- [13] 一名“公知”的微幸福[EB]. 南都周刊，2013年1月14日<http://www.nweekly.com/news/special/201301/32114.aspx>
- [14] Max Weber, “Politics as Vocation.” In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78. 转引自徐贲. 暴力与权力[EB].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1f30100145f.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1f30100145f.html)

#### 参考文献：

- [1] 涂光晋. 表达·交流·争论·整合——新媒体时代新闻评论的变化与反思[J]. 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5期
- [2] 胡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J]. 新闻记者，2012年9月
- [3] 薛洪生、黄琦. 从主流政治话语嬗变看中国政治之变迁——基于若干官方文本的政治学解读. 黑龙江省第二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上册），2010年8月23日
- [4] 刘华蓉. 大众传媒与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 [5] 马立诚.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 [6] 顾肃. 当代社会思潮中的激进与保守、左与右之争[J]. 浙江学刊，2013年第1期
- [7] 房宁. 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J]. 复旦政治学评论，2006年第1期
- [8] 刘瑞生. 网络自由主义思潮趋向偏激[J]. 人民论坛，2012年第24期
- [9] 李卓. 言语的狂欢让网络标签化[N]. 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16日第006版
- [10] 劳麟书. “五毛党”及其他 咬文嚼字 2012年第1期
- [11] 欧文·戈夫曼.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 [12] 管健. 污名研究：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互视角分析[J]. 江淮论坛，2007年第5期
- [13]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 [14] 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 认同的力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P5-6
-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 [16] 方旭光. 政治认同——政治实践的范畴[J]. 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
- [17] 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 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18] Dovidio, J. F., Major, B., & Crocker, J. (2000). Stigma: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 F. Heatherton, R. E. Kleck, M. R. Hebl, & J. G. Hull (Eds.), *Stigm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3). New York: Guilford.
- [19] Leary, M. R., & Schreindorfer, L. S. (1998). The stigmatization of HIV and AIDS: Rubbing salt in the wound. In V. Derlega & A. Barbee (Eds.), *HIV infe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 Link BG, Phelan JC. 2001.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 Rev. Sociol. 27:363-85
- [21] Brenda Major, Laurie T. O' Brien. 200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Annu. Rev. Psychol. 56:393-421

（下转第57页）



权, 这样可以把分散的声音集中化, 通过凝聚的声音表达公民意愿, 提高公民与政府或者企业谈判的能力。不同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与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之间的互动也能够以集体的形式, 增强社会监督的力量和社会的凝聚力, 使公民表达通过和平和理性的方式得到实现。比如在“反对怒江建坝事件”中, “绿色家园志愿者”、“绿岛”、“绿色流域”等非政府组织召开了专家研讨会, 发起“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活动, 并得到来自60多个国家, 80多个组织的支持, 他们培育当地民众的权利意识, 并给怒江民众通过媒体表达自己声音的机会, 使对怒江建坝的政策讨论有了更多元的声音, 并最终促成了怒江建坝政策的搁置。<sup>[9]</sup>避免了像“什邡铜钼项目工程”和启东“污水排海工程”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聚集事件, 以及由此引发的紧张的官民关系。可以说, 尤其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中, 公民组织可以理性地组织抗议, 维持抗议的秩序性, 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非合法聚集和单个公民抗议的极端行为, 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同时, 社会组织可以成为市场和政府的制衡力量, 防止社会出现极端的发展趋势。

作为组织存在, 社会组织也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来运行, 一方面确保组织声音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保证组织运行的稳定性, 既可以防止因公民个人意愿的改变而使集体的声音出现紊乱, 又可以保证公民参与的公开性和平等性。但是, 在我国国家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民主政治的不完善、文化传统和公民维权意识不高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的公民组织发展非常落后, 再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国际性, 政府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也有意无意的限制公民组织的发展。这既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 也不利于突发事件的解决,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总之, 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可以看作是社会机能运行失调的结果, 当然, 这种失调就包含了公民表达机能的失调。没有完善的公民表达机制, 就没有其他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 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在社会转型期, 政府和社会都要不断探索公民权益主张和表达的途径, 尤其要正视民间处理突发事件和保障公民表达权的有益探索, 这是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有效办法。

#### 注释:

- [1] 朱晓青, 柳华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79页。
- [2] 顾小云:《言论自由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理论探索》2006(6)。
- [3] 史献之:《表达权利与和谐社会之间的隐蔽逻辑》, 湖北社会科学, 2008(5)。
- [4] 朱晓青, 柳华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机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79页。
- [5] 赵振宇:《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思考与建议》, 2010年1期《宁夏社会科学》。
- [6] 王赐江:《冲突与治理: 中国群体性事件考察与分析》, 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177页。
- [7] 李树桥:“公民表达权: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中国改革》2007(12)。
- [8] 孟伟:“美国NGO组织发展的经验与借鉴”《特区实践与理论》2009(3)。
- [9] 曾繁旭:《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第100—111页。

~~~~~  
(上接第130页)

- [22] Crocker, J., Major, B., & Steele, C. (1998). Social stigma.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zey (Ed.),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Vol. II, p538). Boston: McGraw Hill.
- [23] Michelle R. Hebl, John F. Dovidio (2005). Promoting the “Social” in the Examination of Social Stigm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Vol. 9, No. 2, 156-182
- [24] Brenda Major, Laurie T. O’ Brien. 200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Annu. Rev. Psychol. 56:393-421
- [25] Steele CM, Spencer SJ, Aronson J. 2002. *Contending with group image: the psychology of stereotype and social identity threat*.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d. MP Zanna, vol. 34, pp. 379-440. San Diego, CA: Academic
- [26] Tajfel H, Turner J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The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ed. S Worchel, WG Austin, pp. 7-24. Chicago: Nelson-Hall